

将帅历险记

JIANG SHUAI

LI XIAN JI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董保存 鲁南 选编

84714

I 247.8
74

将帅历险记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4 号

将 帅 历 险 记

董保存 鲁南 选编

*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南长街甲 81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9.25 印张 字数 229 千字 插页 2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 7—80094—040—3/1·22

定 价：5.85 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许多天以前，我们听到两个小学生的一段对话：

“你看什么书？”

“我看了一本《罗瑞卿的故事》。”

“罗瑞卿是什么人？”

“大将！”

“啊，当官的……”

后面的话更让我们心惊肉跳——

“还不是拍马屁拍出来的！”

这句话让人想了很多很多，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代将帅，居然被他们的后代说成是“拍马屁拍出来的”！多么可悲啊！

是我们的教育不够吗？

是我们的宣传不多吗？

是人心不古吗？

……

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接触到了许多将帅的生平事迹，深知他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是怎样奋斗过来的。他们大都经过严峻的考验，有些情景真是惊心动魄，有的今天听来依然叫人心惊肉跳……这和吹牛拍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

因此，我们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更多的人，特别是青年朋友。我们萌生了编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——把老一代

革命家的历险经历收集在一起，让人们知道他们当年是怎样出生入死，怎样浴血奋战，怎样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流血流汗……

我们敢说，我们所选编的这个集子，是以材料准确、写作态度严谨为所长的。

说到材料准确，我们确实也见到过一些为了赚钱而故意哗众取宠的书刊，他们不管事实准确与否，取一个大得可怕的名字，以此来欺骗读者。而真正的知情者看了，会觉得那是胡编乱造。这样的作品，不仅不会对青年有利，反而会鱼目混珠，制造混乱。

这本书中所选的作品，有的是出自长期在将帅身边工作的同志之手，有的是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，还有的是多年来从事将帅文学创作的作家。他们所用的材料力求生动准确，他们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，他们没有一点材料是编造的。

收入这本书中的作品，多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和专家以及将帅的家人认可的。凡是有争议的作品和有争议的事件我们都没有选入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对读者负责，也为了维护将帅文学的严肃性。

收入这本书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文学性，不是政治说教，更不是一般的党史。它用生动的故事、活泼的语言、曲折的情节，把一个一个将帅独特的个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。你看到的元帅、大将，都不是正襟危坐、着将帅军服的形象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他们在危急关头，也会出一身冷汗，也会满脸通红，也会大光其火……当然也会表现出他们的与众不同，要不，他们怎么能够成为将帅而别人却不能？

在文章的编排上，我们是按照1955年授衔时的先后顺序。这样的编排不是论资排辈，而是为了方便读者。

我们相信，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，特别是广大的青年朋友，一定会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学到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，特别是

他们在艰难困苦之中，怎样奋斗，怎样拼搏，怎样为自己的理想而忘我抗争。

由于我们手头的材料有限，也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，现在所编成的书肯定有不少的缺点和问题，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，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使这本书更加完美。

编 者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

朱德元帅处变不惊	刘学民 (1)
彭德怀元帅遭劫持内幕	马泰泉 (7)
刘伯承元帅险走何小寨	屈德骞 (53)
贺龙元帅西南遇险纪实	谢武申 (69)
陈毅元帅路遇叛徒	胡松植 (80)
罗荣桓元帅险而不惊	李 泽 (86)
徐向前元帅绝处逢生	郭 晨 (101)
聂荣臻元帅城南庄历险	董保存 (135)
叶剑英元帅化险为夷	丁家琪 (150)
粟裕大将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”	朱 樞 华子 (162)
徐海东大将蒙冤不屈	张 麟 (173)
黄克诚大将虎穴脱身	李振墀 (192)
陈赓大将大难不死	尹家民 (211)
谭政大将三次脱险	乔希章 (228)
肖劲光大将幸免于难	张伟 俊岐 (234)

DQ50/29

张云逸大将劳山遇险 赵桂来 (239)

罗瑞卿大将死里逃生 穆静 冰如 (252)

王树声大将巧扮翁婿过难关 芦 笙 (267)

许光达大将只身离寿县 金 江 (280)

朱德元帅处变不惊

刘学民

有人说，朱老总一生“大战三百，小战一千”，战争中险象环生，朱老总却处变不惊。部下们说起这个话题，都会伸出大拇指，用敬仰的口气说：“不愧是我们的总司令！”

“伙夫头”的故事

1927年10月，南昌起义军余部转移到赣南山区的崇义县上堡。在这里，朱德领导了“赣南三整”中的最后一整——上堡整训。

“赣南三整”后，起义军余部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，军心更稳定，士气更高涨。但部队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，给养和弹药无法补充，眼看秋去冬来，官兵们仍穿着起义时的单衣，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，打着赤脚，连双草鞋都没有；这里人烟稀少，无处筹措粮食，官兵们常常饿着肚子；没有药，伤病员得不到治疗；枪支、弹药得不到补充，战斗力越来越弱。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朱德：出路在何方？办法在哪里？

11月初的一天，朱德从报纸上看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移防到湖南柳州、汝城、宜章一带的消息，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：去找范石生！

范石生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，早年是朱德在云南陆军

讲武堂的同班同学。他们交往密切，曾结拜为兄弟，并一起秘密参加了同盟会，一起参加了昆明辛亥重九起义，一起参加过护国讨袁战争。后来，范石生成了滇军名将，讨伐陈炯明叛变中，建立功勋，受到孙中山的赞扬，被委任为滇军第二军军长，授予上将军衔。1926年，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，范石生仍任军长。

范石生同粤系、桂系军阀均有矛盾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。所以，他很想找个盟友。进，可同蒋介石抗衡；退，可杀回云南去重振滇军。当他得知南昌起义军失利、朱德领着一支部队转战赣南的消息后，曾几次派人秘密寻访，以便联络，但一直未找到。

朱德同陈毅商量后，给范石生写了一封信，表达希望合作，结成反蒋统一战线的愿望。不久，收到范石生的复信，他同意合作，希望朱德尽快到汝城当面谈判。

朱德带着经过挑选的一支六十多人的小分队出发了。在去汝城半路上，来到一个小山村，便在祠堂里住下了。朱德再三叮咛哨兵要提高警惕，夜里绝对不能打盹。

由于连续行军，一路疲劳，困顿不堪，夜里哨兵还是打盹了。何其朗的土匪部队借着暮色的掩护，悄悄地摸进村子，枪响后，起义军才知道敌人已经包围了祠堂。小分队立即跃起还击，冲出祠堂。

朱德住在祠堂后面的一间小角屋里，枪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。他知道坏了，肯定祠堂已被敌人包围。他立即翻身下地，还没跨出房门，几个敌人嚎叫着冲进来，躲藏也来不及了。他急中生智，侧身闪进紧挨着的厨房，随手拿起伙夫的围裙迅速系在腰上，就往外走。

几个敌人端着枪，迎面拦住他，问道：

“朱德在哪里？快说！”

“在后面。”朱德从容地指了指后面的房子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另一个敌人用枪逼着他问。

“我？是个伙夫头。”朱德答道。

敌人借着月光左看右看还不放心，又把他拉到灯下仔细打量一番，见他穿着一身补钉摞补钉的衣服，胡子长长的，足有五六十岁，也就信以为真，丢下他，奔后面搜索朱德去了。

“伙夫头”转身折回伙房，打开后窗，纵身跳出，顺着枪声寻找部队去了。

突围出去的战士迅速向敌人发起反击，土匪何其朗哪是起义军的手，没有抵挡一阵子就作鸟兽散了。何其朗本想捞一把，好向国民党领赏，没想到“偷鸡不成反失了一把米”，丢下几具尸体逃跑了。

朱德赶到汝城同范石生谈判，取得圆满成功。朱德化名王楷，起义军用十六军一四〇团的番号隐蔽起来，得到了枪支、弹药、被装，还领到了薪饷。然后，移防到广东韶关的犁铺头，开始了新的整训。他们隐蔽待机，为以后的湖南起义创造了条件。

从那以后，大家便谑称朱老总为“伙夫头”，他自己也常以“伙夫头”自诩。他常说“国民党兵总把我误会成‘伙夫头’”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

处 变 不 惊

1948年5月初，城南庄（河北阜平县）会议一结束，中央就下达了中原战场近期的作战任务，要求华东野战军的第一、三、四、六纵队和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，共六个纵队，全部在中原的黄淮地区集结，准备打大仗，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五师（第五军）。

这一重要作战任务确定后，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

亲临濮阳视察和动员，陪同前往的有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、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。

朱总司令一行乘坐三辆汽车上路了。第一辆吉普车上坐着陈毅和粟裕；第二辆吉普车上坐着朱总司令；后面一辆大卡车上坐着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。这虽然是条南北大道，但年久失修，再加上战争的破坏，坎坷不平，一路颠簸。偏偏老天不作美，又下了一场雨，满地泥泞，走走停停，还得修路，行进速度很慢。

一过邯郸，就进入敌占区。为了安全，陈毅建议车队夜间行驶，在敌人不知不觉下通过封锁线。

这天晚上，车子刚刚发动，还未上路，当地的同志就来报告说：

“前面三十里以外发现有敌人的散兵活动，公路离敌人的据点也只有两三里路。”

走，还是不走？是绕开敌人，还是照直前进？几个参谋犹豫了，警卫参谋去请示朱总司令：“前面发现敌人的散兵，走不走？”

“几个散兵怕什么？走！”朱总司令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汽车开动了，大家都睁大眼睛，注视着前后左右的动静。

为了隐蔽，汽车没有开灯，借着一点朦胧的月光，向前急驶着。

赶了三十多里路，第一辆吉普车突然停下来，陈毅和粟裕跳下车，快步走上一个土岗，警惕地观察着前方。等后面的两辆车赶到时，陈毅向朱总司令报告说：

“前面的确发现有敌人，大约 200 人左右。”

“朝什么方向运动？”朱总司令问。

“正沿着公路向东南方向步行。我们是不是停一下？等敌人过去再走。”

没等朱总司令回答，后面乘坐大卡车的警卫部队来报告说：

“后面也发现敌人，有多少，还未弄清。有几辆汽车正朝我们方向开来。我们是不是先向旁边避一避？”

朱总司令思考片刻，果断地说：

“前后的敌人都不要去管它，我们继续前进就是了！”

朱老总看大家还在大惑不解，有些提心吊胆。便说：

“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‘混水摸鱼’，我看今晚月暗天黑，倒是个混水摸鱼的大好机会。继续前进，提高警惕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但是，没有命令，任何人不准开枪！”

汽车又启动了。朱总司令端坐在前排座上，对司机说：

“老于，把大灯打开，大胆地开吧！”

大灯打开了，两束利剑般的白光，把前面的道路照得通明雪亮。汽车快速地前进着，很快就看到公路上约有 100 名敌人，稀稀拉拉，倒背着枪，歪戴着帽，竖不成行，横不成伍，像是刚刚败下阵的散兵。汽车大灯一亮，敌人立即让开大道，闪在路边，站在草丛里，愣头愣脑地傻看着。有几个还在那里用手比比画画乱指一气。

车队离敌人越来越近，警卫战士们的手指都紧紧扣在扳机上，密切注视着前面的动静。突然，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，二百人齐刷刷地在大路两边站成了两条线，紧接着一声口令：

“立正——！”目送着车队通过。

像捉迷藏一样，这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？

原来，敌人发现车队时，也有个分析估计：起初，他们以为碰上了解放军，吓得赶快躲在大路旁的草丛里。后来，一看只有三辆车，而且是两辆吉普、一辆大卡车，车上又有国民党军车的标志，认定上面坐的一定是大官，所以赶快列队迎送。

说也凑巧，后面敌人的那几辆车，渐渐赶了上来，看着前面的部队那种列队迎送的架势，认定车上准是“大官”。所以，总是保持着三五百米的距离，也不敢超过朱老总的车队。就这样，在

天亮之前，顺利地通过了敌占区。

一进入解放区，车队飞速前进，直向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——濮阳驶去。

朱总司令处变不惊，硬是带着两员大将，乘着汽车从敌人鼻子底下，通过封锁线，于5月11日安全抵达濮阳。他听取汇报后，向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团以上干部作了重要报告，动员大家学习战术，用“钓大鱼”的办法，寻机歼灭整编第五师（第五军）。5月18日他离开濮阳，安全返回总部。

彭德怀元帅遭劫持内幕

马泰泉

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史无前例的速度，迅猛席卷神州大地。已被毛主席任命为大西南“三线”副总指挥的彭德怀，一夜之间，成为林彪、江青及其御用鹰犬们追捕的对象。一代元戎，在劫难逃。在阴谋与罪恶裹挟之下，滴下来的是血肉的颤栗和历史的呻吟……

—

岁序依旧不息地轮转。太阳还是天天从沧海升起在桑田沉没。

抚今追昔，彭德怀越发感到时间的珍贵。他本想在下面多跑些地方，然后写一份综合调查材料，呈报毛泽东和党中央，可是时间对于他已经变得异常吝啬，时间将宣告他重新工作的机会并不多了。

这天一大早，景希珍突然接到建委的电话，要彭德怀马上返回成都开紧急会议，什么内容没有透露。

“什么事这么紧急，又这样秘密？”彭德怀感到奇怪。

“彭总，要不要我回电话问一下？”一直陪同视察的副秘书长杨焙也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既然来电话不肯告诉会议的内容，那就算了。反正到那里

就晓得了。”

回到成都后，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贯彻中央《五·一六通知》。参加人员是建委局长以上的干部。会议进入后期时开始联系实际，理所当然地把矛头指向了彭德怀。

大会要彭德怀做检讨，要他承认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揭发出来的一系列罪行，要他交待到西南后所进行的新的“反党”活动。

会议开了一个多月。收获呢，便是拟定了彭德怀到西南后的十余条“罪状”，编印出简报，上报中央，不发各局。

彭德怀对这种以突然袭击的手法，造谣生事、胡编乱造、栽赃陷害的行为，极端气愤。他在会上摆事实讲道理，没有做任何检讨。

“人要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。毛主席对我彭德怀总还有一些情分呢？可这些人却毫不留情！我刚出来工作，就又拉开架势批判我来了！娘的，批吧！叫我认罪，叫我低头，无论如何做不到！休想！”他向杨培等人滔滔不绝地诉说满腔的忿懑与苦衷，“噢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总算建委的一名成员吧？为什么中央文件不发给我？我要向毛主席告状！我要给李井泉写信，不让我看党的文件是谁决定的？”

杨培劝慰他说：“彭总，您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建委为何对您这样，这是有来头的。中央文革几次打电话询问情况，让建委也很为难。上边的态度那么坚定，建委也只得照办啦……所以，您思想上还是得有个准备才是啊。经请示井泉同志，现在把中央文件给您送来了，您好好看看吧！”

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早就是个败名朝野的人了，思想准备不准备都无所谓，无非是打倒了再掀起来再打倒！”

暮色四合。

他的心里就像四合的暮色一样，越发感到沉重。

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，双目凝滞，面色铁青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景希珍悄悄把屋里的电灯拉亮了，他也没有察觉。他的心里依然是黑漆漆的。他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与茫然之中。

他想念自己的侄儿、侄女，他渴望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。他在给彭梅魁的信中写道：

西南局在《五·一六通知》下来后，很快召开了会议，这个会的目的完全是冲着我来…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但他们揪住我不放，又在逼我，又说起了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，翻起了旧帐，围攻我，让我写检讨，揭发自己，批判自己，和1959年一样，在逼我，让我承认我要翻案，我是反党分子……

梅魁你若能抽出时间的话，来成都一次，我有事给你说……

没想到就在他发信后的第3天，彭梅魁已经到了成都——说来多巧啊，也许是心灵的感应吧？伯伯思念侄女，侄女也思念伯伯。伯伯给侄女写信的同时，侄女正在去看望伯伯的路上。

彭梅魁的到来给彭德怀带来莫大安慰！

是政治气候的骤变触动着她敏感的神经。她感到有种不祥之兆向伯伯袭来。她实在为伯伯担心。她清楚地记得在伯伯来西南之前，她请求伯伯无论有多忙，也要半个月给她写封信，好让他们姐弟们放心。彭德怀当即不假思索地应诺下来。到西南的前几个月里，尽管视察工作很忙，他都坚持每到一地给侄女写信，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亲人。可是最近一个来月，彭梅魁一直没有接到来信。她着了急，每天总要三番五次到传达室的信箱里看看，每次都失望而归。这天夜里她做了个恶梦，梦见伯伯在视察途中遇到一场罕见的山体滑坡，崩塌的山岩遮天盖地地压了下来，她的